

# 关于反腐败工程学的研究与思考

潘一山<sup>1</sup> 王喜满<sup>2</sup> 罗浩<sup>3</sup> 鲁国军<sup>4</sup>

(1.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136; 2.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反腐败研究中心,辽宁沈阳110136;  
3.辽宁大学信息学院,辽宁沈阳110136; 4.辽宁大学纪委综合监察室,辽宁沈阳110136)

**摘要:**随着党建工程中反腐败斗争地位日益彰显、国内外反腐败实践不断深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紧迫、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学科交叉深度融合,创新性提出反腐败工程学恰逢其时。反腐败工程学基于腐败机会、公共权力、腐败动机三者作用的发生机理,把腐败现象分为腐败动机为主、腐败机会为辅型和腐败机会为主、腐败动机为辅型两类,通过强化不敢腐震慑力的腐败危险性评价、加强不能腐约束力的权力信息化监督、增强不想腐感召力的腐败倾向性测试,进而为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新理论、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探索。

**关键词:**反腐败工程学;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2-0007-09

目前,将工程学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社会工程学”“宪法工程学”“政治工程学”“组织工程学”“选举工程学”“制度工程学”等学科。反腐败工程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结合国内外反腐败最新实践和紧迫现实,运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sup>①</sup>进行综合治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应用科学。

## 一、反腐败工程学的提出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sup>②</sup>反腐败工程学作为一门学科亦是如此。

### (一)源于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认为腐败是随着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其重要原因是私欲泛滥的人掌握了权力,反腐败需要从权威、机构、纪律、监督、法令等方面加强建设,使得一切权力的使用都处于监督之下。毛泽东首次提出党建是个“伟大的工程”论断,特别重视人民监督和思想政

收稿日期:2023-01-12

作者信息:潘一山,工学博士,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煤矿冲击地压研究和党建工作。

王喜满,法学博士,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研究。

罗浩,工学博士,辽宁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研究。

鲁国军,文学硕士,辽宁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纪检监察实务理论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特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苏东剧变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党国际团结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AGJ008);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XLYC1904005)。

① 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治教育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力求“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sup>①</sup>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抓党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sup>②</sup>“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sup>③</sup>江泽民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sup>④</sup>思想,主张反腐败这一系统工程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总体思路。胡锦涛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sup>⑤</sup>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将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全局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sup>⑥</sup>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上述反腐败思想是反腐败工程学的理论根基。

## (二)源于中外反腐败鲜活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对官吏的选拔与培养、监察与考核、法制与惩治相结合的廉政建设。近代也探索了廉政文化、廉政制度、廉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的这一高度,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走出了一条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注重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三不腐”一体推进、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标本兼治和系统治理之路。国外关于权力制约、依法治权、反腐败国家立法、运用高科技手段反腐、加强国际联合反腐等一些做法也是重要借鉴。中外反腐败鲜活的实践经验是反腐败工程学的重要依据。

## (三)源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中国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关键在党。“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sup>⑦</sup>解决腐败这个世界性难题,当前仍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如遏增清存的任务依然艰巨,不收敛不收手的胆大妄为者尚存,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仍在发生,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潜滋暗长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永远吹冲锋号,深化标本兼治,“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sup>⑧</sup>才能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是反腐败工程学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2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4页。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9-70页。

#### (四)源于新科技革命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崭新气象

20世纪后半叶,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础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混沌理论和突变论等实现了科学范式的演进。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蝶变式发展,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如系统工程学、社会工程学的提出。网络舆论作为新的监督方式的出现,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为反腐败数据赋能、科技赋能的彰显,深刻改变了反腐败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新科技革命为解决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手段。与此同时,交叉学科建设已经随之成为世界各国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内容,如美国于1985年就拥有10个交叉学科,德国于1979年成立首个跨学科研究专业组织——国际跨学科研究会,日本于20世纪中叶开始关注交叉学科建设等。“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建设方兴未艾。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为交叉学科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最新指导,也为反腐败工程学提出了行动指引。

## 二、反腐败工程学的构架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①</sup>反腐败工程学的构架包括腐败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腐败产生机理与分类、腐败危险性评价、权力信息化监督、腐败倾向性测试等方面。

### (一)腐败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综合近年来腐败现象,腐败表现出复杂性、时滞性、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多样性、破坏性等特点。复杂性是指腐败发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机械的,而是多元的、动态的;腐败的治理不是轻轻松松的,而是任重道远的。时滞性是指腐败行为从发生到暴露有延迟,有的腐败行为短期内便可侦破,有的1—2年才能发现,而有的则需要更长时间。系统性是指相互关联的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运用潜规则发生的隐性腐败。行业性是指群体腐败发生在有实权或者特权的某个行业内。区域性是指腐败发生的地区可能是村(社区),乡镇、县(区)、市,乃至省等。多样性是指腐败的衍生品不断更新,腐败手段不断翻新,腐败行为更为隐蔽、高科技化等。破坏性是指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等造成的严重危害。

基于腐败特征,其影响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本文提出将腐败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三类:一是腐败机会,二是公共权力,三是腐败动机。腐败机会是影响腐败发生的客观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包括制度上的缺失或不完善,经济上腐败成本低,社会不良风气和低俗文化的消极影响等。公共权力是腐败发生的前提条件,体现在公共权力归谁所有、为谁所用、如何配置、怎样行使等诸多方面,如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失衡、失约、滥用等。腐败动机是影响腐败发生的主观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因人而异,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动态变化。腐败动机包括追求经济利益、求政绩、求便利等,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私欲膨胀和思想道德落后。

### (二)腐败产生机理及其分类

关于腐败产生原因、理论和模型,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反腐败战略理论等,建立了数理模型、扩散模型、动力系统模型等,<sup>②</sup>对世界反腐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综合以上理论、模型和腐败主要影响因素,本文认为腐败产生的机理是具有腐败动机的人(组织)在行使公共权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9页。

② 任建明、杜治洲:《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101页。

过程中,获得腐败机会,达到临界状态造成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导致腐败行为发生。其中临界状态可以用冲击地压扰动响应失稳理论<sup>①</sup>进行解释,如图1所示,当人(组织)行走在权力和制度(机会)限定的范围内,则处于稳定状态不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当人(组织)行走在权力和制度边缘时,则处于非稳定状态,一旦受外界扰动就容易发生腐败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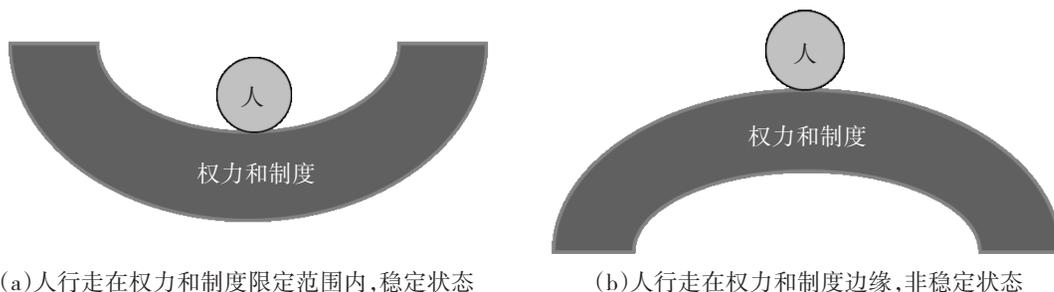


图1 腐败产生的扰动响应失稳理论解释

基于研究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不同,腐败的分类也各不相同,部分分类甚至存在交叉的现象。本文按照腐败产生机理,把腐败现象划分为腐败机会为主、腐败动机为辅型和腐败动机为主、腐败机会为辅型两类。腐败机会为主、腐败动机为辅型:此类腐败以腐败机会为主因,在腐败动机的助推下而导致腐败实际行为的发生,主要指腐败行为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发现制度漏洞或因腐败成本较低等而诱发投机取巧心理,最终走向腐败;腐败动机为主、腐败机会为辅型:此类腐败以腐败动机为主因,在腐败机会的助推下,出于个人的私利性动机而逐步被腐败围猎或者是主动走向腐败,包括因个人私欲膨胀、道德堕落导致对经济利益、政绩、行事便利等的盲目追求。

### (三) 强化不敢腐震慑力的腐败危险性评价

腐败危险性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具有发生腐败的危险程度。根据腐败发生机理,可对所关联的腐败机会等信息进行评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而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腐败危险性评价是一种整体的、宏观的评价方法,能够确定腐败危险等级。

1995年透明国际建立了腐败感知指数(CPI)排行榜,评比依据是13个独立调查机构的数据,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排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入榜,必须至少被3个独立调查机构调查,以满分100分代表最清廉。该指数反映的是全球各国商人、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观察和感受。<sup>②</sup>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WGI)作为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CPI)的补充,也是显示世界各国腐败程度的重要指标。治理指数的测量主要围绕6个方面: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程度、政府的效率、法规的质量、法制度、腐败控制。<sup>③</sup>2014年11月14日,我国广州发布了“城市廉洁建设指数”,该指数将主观与客观指标相结合,在指标体系上分为投入、机制、结果、效果等四个层面。指标测评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人民群众,并明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等测评指标是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sup>④</sup>测评指标体系分为三个指标层次,其中一级指标为廉洁状况、建设绩效、潜在风险等3个维度,二级指标为11个方面,三级指标为61项指标,对城市廉洁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sup>⑤</sup>

① 潘一山:《煤矿冲击地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② 李后强、李贤彬等编著:《计量反腐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2-173页。

③ 李菡:《拉美国家腐败特点及腐败感知变化的初步分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 李后强、李贤彬等编著:《计量反腐学》,第175页。

⑤ 《广州发布“城市廉洁建设”指数 廉洁将量化测评》,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4-11-15访问。

腐败危险性评价基于腐败机会进行评价,可采用综合指数法或层次分析法等,指标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系统分析评价单位整体腐败危险性。如表 1 所示,以政治领域为例,对照腐败危险性评价指标,逐项量化打分,对腐败危险性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研判和评价,得到腐败危险综合指数所对应的危险等级(对照表 2 所示)。评价结果若为中等危险或强危险等级,应对评价对象单位发出预警。

表 1 腐败危险性评价指标(政治领域)

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区间划分说明
W <sub>1</sub>	党的领导	政治建设	由专家和代表性群众根据二级指标进行赋分,分别取 0,1,2,3 四级,对应二级指标危险指数 w <sub>i</sub>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 ..	
W <sub>2</sub>	选人用人	民主集中制	
		选人用人程序规范	
		正向激励机制	
		改革创新容错纠错机制	
		... ..	
W <sub>3</sub>	党风建设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四风问题专项治理	
		干事创业的优良作风	
		领导干部联系机制	
		... ..	
W <sub>4</sub>	信息公开	党务信息公开	
		政务信息公开	
		财务信息公开	
		... ..	
... ..	... ..	... ..	
腐败危险性综合指数		$W_t = \frac{\sum_{i=1}^n w_i}{\sum_{i=1}^n w_{imax}}$	

表 2 腐败危险性评价综合指数划分及危险等级

腐败危险综合指数	指数区间划分	腐败危险等级
$W_t = \frac{\sum_{i=1}^n w_i}{\sum_{i=1}^n w_{imax}}$	[0.00, 0.25]	无危险
	[0.25, 0.50]	弱危险
	[0.50, 0.75]	中等危险
	[0.75, 1.00]	强危险

(四) 加强不能腐约束力的权力信息化监督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基于腐败产生机理可针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切实加强不能腐的约束力。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手段不断成熟,为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和手段(如图 2),加强了权力信息化监督的安全性、实效性和准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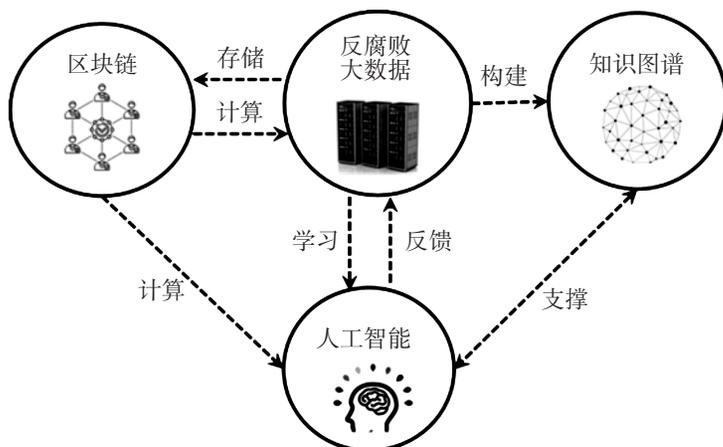


图2 信息技术在腐败监督中的应用

反腐败大数据具有源头广泛、规则多样、线索隐蔽等特点,特别需要有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能力,将各类数据源的关键环节打通,形成数据关联,并通过模式识别等技术手段开展纪检监察业务,以便准确发现可疑的问题线索。沈阳市纪委监委建设纪检监察内、外网数据池,探索大数据监督与强化政治监督、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治理深入融合,以强监督促进强监管,如2022年在民政领域,整合低保、残疾人双补、违规土葬等业务数据构建有效监督模型,推动市民政局通过全市民政数据再比对、再核实、再整改,并重新修订政策文件6份,完善市民政服务管理平台,从源头上堵塞问题漏洞。

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在权力信息化监督中,可将权力行使过程存储在分布式账本中,追溯交易的历史记录,且记录不可篡改或删除;同时,区块链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自动计算一些规则和条件,例如对政府采购的限制条件、对资金使用的审计等,实现权力监督的公开透明,提高反腐败监督的准确性和效率,有助于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监督的公信力。

知识图谱是一种基于语义技术构建的知识表示和推理技术。在权力信息化监督中,知识图谱能够将政府文件、企业报告、社交媒体等各种数据整合为结构化的图谱,通过分析各种数据源中的关系和衔接,发现潜在的腐败线索和关联,同时知识图谱还可以基于数据源中的规则和关系,自动地生成决策支持,例如权力行使过程的风险评估、关系网络分析等,帮助纪检监察部门快速、准确地作出决策。

人工智能在反腐败监督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学习大量的数据,以发现与腐败相关的模式和趋势,为监管机构作出决策提供支撑,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分析相关招标数据,能够帮助发现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同样,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权力行使过程行为模式来预测可能的腐败事件,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预测哪些组织可能存在腐败行为,并对其进行深入调查。

#### (五)增强不想腐感召力的腐败倾向性测试

腐败倾向性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基于私欲内因非公共运用权力的发展趋向性。腐败倾向性和腐败行为的实际发生高度相关,一般来说,腐败倾向性越高,表示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2013年12月17日南京市推出《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提出“公职人员腐败心理指数”用于量化测试腐败心理轨迹和职务犯罪的“距离”。该手册共34问,分别从动力因素、调节因素、特征因素、心态因素、潜意识等5个方面自测腐败心理倾向并进行风险评估。根据各因素的得分,测出公职人员的腐败心理指数,当五类因素测出的高分题目越多,职务犯罪后果越严重。<sup>①</sup>

腐败倾向性测试可采用量表测量法。腐败倾向性测试一般使用个体气质型测量量表,主要包括

<sup>①</sup> 李后强、李贤彬等编著:《计量反腐学》,第176页。

贪婪特质量表(Mussel等,2014)<sup>①</sup>和倾向性贪婪量表(Seuntjens等,2015)<sup>②</sup>。测试题目例如,“当有东西被分享时,我试图尽可能地获得更大的利益”“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有太多的钱”“我的人生格言是‘多多益善’”,量表一般采用李克特式五点或七点量表,要求被测试者对每一道题目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进行打分。除上述两种量表,还有物质量表(Richins等,1992)<sup>③</sup>、赫克托—贪婪的回避量表(Lee等,2004)<sup>④</sup>、自发贪婪量表(Veselka等,2014)<sup>⑤</sup>、倾向性贪婪量表(Krekels等,2015)<sup>⑥</sup>、国家规模量表(Mussel等,2016)<sup>⑦</sup>等测量方式。

本文使用贪婪特质量表(Mussel等,2014)的7个题目测试了54名公职人员,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0.758,表明其在中国群体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量表中的每个题目赋分具体为:强烈赞同得7分、中等赞同得6分、轻微赞同得5分、中性得4分、轻微不赞同得3分、中等不赞同得2分、强烈不赞同得1分。得分越高,贪婪特质越高。对量表的7个题目进行项目分析(见下图3),发现只有3个项目的得分在高分组与低分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 )。量表总体平均分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规律,均值为3.72,标准差为1.098,显示了所调查群体贪婪倾向性还不到中等水平,廉洁程度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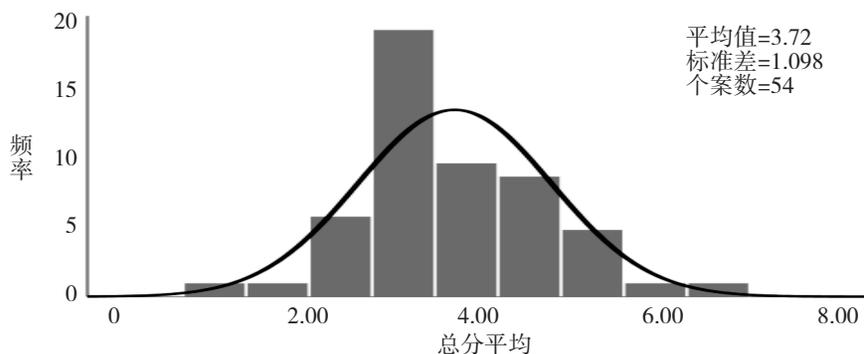


图3 贪婪特质量表总平均分频率分布图

腐败倾向性测试还可采用行为分析法。通过模拟真实社会的腐败场景,将被测试者置于不同的经济博弈场景,分析其行为方式,作为测量腐败倾向的参考指标。例如,Armand等(2022)设置了一个腐败游戏来描述实际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得出“领导人和公民都参与了腐败”等有价值的结果。

目前的量表测量法缺乏本土化的修订,我们首次将贪婪特质量表应用于中国群体,发现4/7的题目无法通过项目分析,需要继续完善。目前还没有见到国内将行为分析法应用于反腐败领域,将来的博弈任务设计也要考虑本土化。量表测量法和行为分析法对被测试者的合作和诚实程度依赖较大,

① Mussel, P., Reiter A. M., Osinsky R., and Hewig, J. “State—and trait—greed, Its Impact on Risky Decision-making and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Social Neuroscience*, vol.10, no.2(2014), pp.126–134.

② Seuntjens T. G., Zeelenberg M., Van de Ven N., and Breugelmans S. M. Dispositional Gre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08, no.6(2015), p.917.

③ Richins M. L., and Dawson S.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19, no(1992).3, pp.303–316.

④ Lee K., and Ashton M. C.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XACO Personality Inventory.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vol.39, pp.329–358.

⑤ Veselka L., Giammarco E. A., and Vernon A. The Dark Triad and the Seven Deadly Si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67(2014), pp.75–80.

⑥ Krekels G., and Pandelaere M. Dispositional Gree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74(2015), pp.225–230.

⑦ Mussel P., and Hewig J. The Life and Times of Individuals Scoring High and Low on Dispositional Greed.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64(2016), pp.52–60.

数据结果也容易受到主试者和其他被测试人的影响。另外,腐败是一个负性的、隐晦的概念,直接测量很容易诱发“社会称许性反应”,被测试者容易“装好”,难以测量到真实情况。因此,开发内隐地、间接地测量腐败倾向性的工具应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比如,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追踪被测试者的眼球运动轨迹、注视区域不同和注视时间长短来获得其兴趣、动机等信息,进而了解被测试人对金钱、权力、美色等因素的欲望程度,侧面反映其腐败倾向性。

### 三、反腐败工程学的价值与思考

反腐败工程学运用新文科、新工科的理念和方法,将反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以系统思维一体推进“三不腐”,其目标是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一) 反腐败工程学有利于拓展反腐败理论研究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不断深入,理论界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各类腐败问题和腐败行为进行分析研究,产出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sup>①</sup>把反腐败当作一项配套运作的系统工程,进而从工程学的学科视角研究腐败机理、分类、测试、评价和信息化监督等相关问题,拓展了反腐败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实现了反腐败研究思维模式的转变。

#### (二) 反腐败工程学有利于拓宽反腐败实践探索道路

与侧重依赖廉政制度开展反腐败的策略有别、与仅仅依靠权力制约开展反腐败的做法不同、与单纯强调廉政文化开展反腐败的思路相异,反腐败工程学依据腐败发生规律、产生机理进行分类,开展基于腐败机会的危险性评价、权力信息化监督、腐败动机的倾向性测试,进而相应增强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为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新的实践模式(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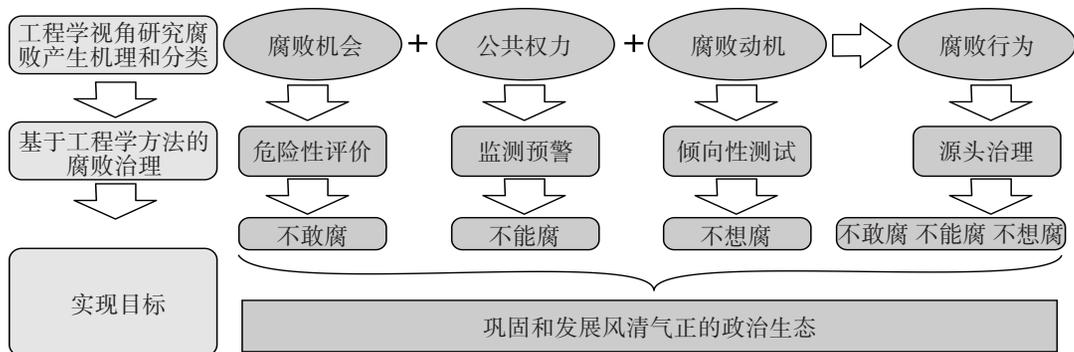


图4 反腐败工程学研究架构

#### (三) 反腐败工程学有利于融合创新多样化的信息技术

面对各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的潜滋暗长,传统的定性分析加人工判断与人工处罚的反腐败工作机制严重制约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当前,大数据监督平台、“阳光三务”“阳光校园”系统平台、大数据分析研判软件、智慧案管、智慧审理、智慧留置等各类科学技术手段不断运用到反腐败工作当中,拓宽了问题线索发现渠道、提升了案件查办效率、提高了证据固定精准性,使反腐败工作质效得到革命性提升,为我们研究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新的更大实践探索空间。反腐败工程学的提出,为我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

们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强化“三不腐”一体推进提供了有力武器,既是清除腐败存量的重要工具,又可以作为遏制腐败增量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腐败“黑数”有效缩减,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同时,把信息技术融入反腐败斗争也能产生新范式、新平台、新手段,这些新发明、新创造同样是科技创新的表现。

#### (四)反腐败工程学有利于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反腐败工程学能够为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腐败危险性评价有利于不断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防范政治风险,提升消除存量遏制增量的成效、夯实政治根基,培育正气充盈的社会风气、增强政治活力,发展清正廉洁的政治文化、净化政治灵魂。权力信息化监督有利于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腐败倾向性测试有利于提高政治素养、坚定政治立场、恪守政治原则、把准政治方向、永葆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2022年辽宁省纪委监委面向全省开通“辽宁阳光三务”平台,群众可随时随地查询、监督、反馈、评价“阳光三务”工作,依法依规正确行使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通过公开防腐败、公开促公正、公开赢民心,将权力晒在阳光下,让群众明白,让干部清白,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切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家园。<sup>①</sup>

## Research and Thinking on the Anti-corruption Engineering

PAN Yishan<sup>1</sup>    WANG Ximan<sup>2</sup>    LUO Hao<sup>3</sup>    LU Guojun<sup>4</sup>

(1.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2.Marxism College of Liaoning University/Anti-corruption

Research Cent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3.College of Inform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4.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ffic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It is timely to innovatively propose anti-corruption engineer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sition of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the deepening of anti-corruption practice both home and abroad, the increasing urgency of moderniz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opportunity, public power and corruption motives, anti-corruption engineering divides corruption into two categories: corruption motives as the main factor and corruption opportunity as the main factor. By the risk assessment of corrup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terrence of being scared of corruption, the power informatization supervision of reinforcing binding force of being unable of corruption and the tendency test of corruption for enhancing the appeal of refusing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engineering provides a new theory, a new pattern, a new method and a new exploration for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engineering; public power; corruption motives; corruption opportunity; political ecology

【责任编辑 至 仁】

<sup>①</sup> 《“辽宁阳光三务”平台正式上线》,辽宁省人民政府政务网,[http://www.ln.gov.cn/ywdt/jr1n/wzxx2018/202207/t20220714\\_4614984.html](http://www.ln.gov.cn/ywdt/jr1n/wzxx2018/202207/t20220714_4614984.html),2022年7月13日访问。